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SHANGHAI ON STRIKE

上海罢工

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ur

「美」裴宜理 著
刘平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SHANGHAI ON STRIKE

上海罢工

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ur

〔美〕裴宜理 著
刘平 译

社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美]裴宜理著;刘平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5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978-7-214-07078-4

I. ①上… II. ①裴…②刘… III. ①工人运动—历史—研究—上海市 IV. ①K2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7276 号

书 名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著 者 [美]裴宜理

译 者 刘 平

责任编辑 张惠玲

装帧设计 陈 契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1304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插页 2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078-4

定 价 27.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中译本序

裴宜理

拙著《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中译本面世,对我来说乃是极大的荣誉。我想,书中的许多观点肯定会引起中国学者的争议,我希望他们的反响能够激发出针对中国工人之社会起源和政治影响的热烈讨论。就本书主题而言,中国学者比我更有发言权,我期待着从他们的批评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我对上海工人运动发生兴趣,源于自己对近代中国的民众反抗、革命和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的长期痴迷。我的处女作是有关 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中期淮北地区农村动乱问题的研究。^① 我认为,传统形式的农民暴动之发生,亲缘与地缘关系比起阶级地位更为重要。我在该书中指出,这些传统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进入这一地区开展动员农民工作的共产主义革命者陷于两难境地。尽管共产党干部吸收利用了既有的暴动模式,但在 1949 年后,他们也将全新的阶级斗争方式引入了中国农村。

当我将研究目光从遥远的淮北农村转向世界大都会上海时,我的研

^① 即《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0 年。此书已由河北大学历史系池子华教授与我共同译出,等待出版。——译者注

究重点也从农民叛乱问题研究变为工人运动研究。但即便是在这一高度“现代”的背景之下,我发现,在不断演进的反抗方式中,与工人中存在的世俗关系——地缘祖籍、性别、文化程度等等——相比,阶级地位的作用仍然不那么突出。当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干部着手在上海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时,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工人队伍中既有壁垒的深刻影响。反之,这两个政党不同的社会基础也深深地刻画出了先是国民党政权然后是共产党政权的不同特性。

虽说本书研究立足于上海、南京、台北和美国的档案文献,但我很清楚,书中肯定还有不少重大局限和疏忽之处。而且我也知道,其他学者从不同的分析角度入手,虽然占有同样的资料,却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所以,重复一遍,值本书中译本问世之际,我期待着批评与建议——无论是经验上的还是理论上的。

我要对那些为本书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作出不懈努力的人表示感谢,尤其对刘平先生在翻译上以及对刘东先生在协调出版方面所作的努力,我深表谢意。同时,我要再次表达对我的许多上海朋友——他们分布于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感谢,感谢他们在过去岁月里所给予我的慷慨支持。最后,我要强调一点,对于本书事实上或是诠释中可能存在的缺点,责任自负,与上述个人和单位无涉。

英文版原序

裴宜理

对我来说,写作本书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出生于共产党占领前夕的上海,当我在日本和美国长大时,我一直对这座我父母曾经度过 20 载动荡岁月的城市迷恋不已。30 余年的隔断,我一直期盼着能回到我的出生地上海——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获得签证通行的目的地。第一次回乡是在 1979 年春天,当时不仅仅是一次消解乡恋情怀的旅行,也是一次寻找研究机会的访问。然而,直到好几年过去,在众多个人和单位的支持、帮助下,我才最终得以在我的出生地开展认真的研究。

在此项研究的众多援助者中,首先要感谢两家单位:中国方面,以张仲礼院长为首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巧的是,张先生曾经在我父亲所在的圣约翰大学学习过);美国方面,乃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尤其是玛丽·布朗·布洛克和罗伯特·盖耶。后者提供的资助使我得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1986—1987 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丰富的档案资料使我所从事的上海工人运动研究得以完成。这些资料中,包括成百上千件老工人访问记录,这些访谈录都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中国学者辛²

勤劳动的结果。可以肯定,这些访谈录反映了特定的政治环境,其目的是揭示共产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基础。而且,因岁月流逝,被访问者的叙述肯定会有疏漏之处。然而,瑕不掩瑜,这些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去了解上海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工作和反抗情形的窗口——通过工人自身的语言。而且,在相同事件上,工人口述史与共产党官方记述之间的差异似乎验证了这些访谈的坦率。也正是这些差异使我形成了本书的核心观点——我的发现往往与以往上海工人运动史论著不同。对那些引导我接触到这些宝贵资料的学者——虽然他们可能不同意我的许多结论——我深表谢意: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陈卫民和郑庆声、经济研究所的陈增年和徐新吾。

工人访谈录虽说很重要,但它们只是我在上海所使用的大量资料中的一部分。确实,我对这些访谈录的信赖是建立在其他可信的档案文献基础之上的。工厂档案——最著名的为英美烟公司档案和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既有工人访谈录,又有厂方档案,实为珍贵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本书引用的资料还包括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政府文件,包括罢工统计、警方报告和仲裁记录等;以及上海市总工会保存的数十种厂史未刊稿;上海港则提供了其他资料。本书使用的关键性期刊主要保存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上海市图书馆。对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和职员所提供的友好合作,以及对上海社会科学院外办(特别是王德华和田国培)穿针引线的帮助,我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除上海之外,其他地方的几家档案馆和图书馆也使我获益良多。台北的党史文献馆以及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使我得以利用国民党时代的许多重要政府文件。台北的调查局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共产党方面的报告。台北的中央图书馆、东京的东洋文库、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斯坦福胡佛研究所以及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都为我提供了真诚热情的帮助,我也要向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和职员,向为本人到上述地方开展访问研究提供资助的美国学会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表示衷心感谢。

在为本书写作搜集资料的不同阶段,我要向下列诸位表示谢意:乔治·布朗、蔡少卿、戴英璁、耐尔·戴芒、江柯林、李逊、刘昶、刘石吉、凯文·马其奥罗、施家英(音)、马修·索默、蒂尔·托恩顿、萧功秦和杨久义(音)。与本书相关的论文曾经提交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国立台湾大学、华盛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有关学者的评论使我受益匪浅。该书主体部分完成于1988—1989年华盛顿大学给予的学术休假年。初稿出来后,玛丽-克莱尔·白吉尔、查尔斯·伯吉斯、周锡瑞、马克·弗雷齐尔、爱伦·富勒、艾米莉·荷尼格、安德鲁·瓦尔德、杰弗瑞·瓦瑟斯特龙和叶文心等人细心阅读,提出了宝贵意见。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计划秘书劳莉·波拉克和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莫利尔·贝尔的指点帮助。本书索引工作由蒂尔·托恩顿完成。尽管有幸得到如许帮助,上述人员对本书存在的问题不负任何责任。

本书——专注于上海工人的起源及其政治倾向——乃是本人计划中的两卷本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的第一卷。在第二卷中,我将探寻工人运动与现代中国政府之形成和演变的关系。

目 录

中译本序	裴宜理	1
英文版原序	裴宜理	1
导 论		1
中国工人的政治影响		3
政治——从头开始		5
第一部分 地缘政治,1839—1919		11
第一章 移民城市		16
广州移民		19
宁波移民		22
江苏—华北移民		25
原籍、职业与工人团结		28
第二章 来自南方的工匠		34
行会与工匠群体		34
早期的工匠抗议		41
政治化		43
“传统”的激进主义		47

行业意识与阶级觉悟	50
第三章 来自北方的无产者	52
乡土源流与帮会	53
工厂以外的劳动者	56
产业无产者	60
大众文化	63
罢工模式	66
结 语	69
第二部分 党派政治,1919—1949	79
第四章 激进主义的全盛期,1919—1927年	85
五四运动	85
共产党的诞生	89
保守派的挑战	92
统一战线	95
五卅运动——脆弱的联盟	100
三次武装起义	104
第五章 保守主义时期,1927—1937年	108
帮会与蒋介石的崛起	108
国民政府时期——工人组织由盛而衰	112
帮会的插手	116
共产党“左派”	126
结 语	129
第六章 激进派的复活,1937—1949年	133
抗日战争与工人民族主义	134
内战与共产党工匠	142
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	146
积极反共	150

国民党势力的瓦解	152
结 语	155
第三部分 产业政治	157
第七章 烟草业	161
劳动状况	163
地缘性分裂	169
共产党的介入	173
帮会因素	175
五卅罢工	177
三次武装起义	181
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英美烟公司	182
共产党的收获	190
内战时期的斗争	192
结 语	194
第八章 纺织业	198
缫丝业	199
早期罢工及其组织	201
帮会的介入	202
共产党的收获	206
缫丝工人之有限的激进主义	208
丝织业	213
贵族工人的觉醒	215
社会构成与大众文化	218
1934年美亚绸厂罢工	222
1936—1937年的全市罢工	235
共产党的复活	243
结 语	249

第九章 运输业	253
电车业	253
法商电车公司	256
人力车夫	264
码头工人	273
结 语	275
结 论	278
中国内部的比较	279
工匠和欧洲工人运动	282
半技术性工人和美国工人运动	286
非技术性工人——农民与工人运动	289
无产阶级罢工的意义	291
中国工人运动的遗产	297
附 录	304

导 论

由于对 20 世纪的工人未能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崇高理想感到失望,新一代工人问题研究者开始关注无产阶级政治的局限性,特别是关注工人的分裂特性。由于有性别、年龄、人种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在共产主义梦幻家的眼里,工人行动分散,缺乏阶级觉悟。当工人问题研究者勉强接受其研究对象的缺点时,这种论调带有很深的悲观主义色彩。当学者们发现工人对于激进运动——最具工人阶级特征的部分——天生缺乏热情,与《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相去甚远时,他们又不免加以冷嘲热讽。^①

① 有关重要著作可参见 Jeffrey Haydu, *Between Craft and Class: Skilled Workers and Factory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Berkeley, Calif., 1988);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 eds.,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1986); Victoria Bonnell, *Roots of Rebellion* (Berkeley, Calif., 1983); Ronald Aminzade, *Class, Politics, and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New York, 1981); Dick Geary, *European Labour Protest, 1848 - 1939* (London, 1981); Diane Koenker, *Moscow Workers and the 1917 Revolutionary* (Princeton, N.J., 1981); William P. Sewell,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New York, 1980); Michael P. Hanagan, *The Logic Solidarity* (Urbana, Ill., 1980); I. Prothero, *Artisans and Politic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 (London, 1979); Herbert G. Ge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1977); Bernard H. Moss,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Labor Movement: The Socialism of Skilled Workers* (Berkeley, Calif., 1976); Joan W. Scott, *The Glassworkers of Carmaux: French Craftsme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a Nineteenth-Century City* (Cambridge, Mass., 1974).

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未竟事业的回应,工人问题研究者常常被“为什么不”的问题所困扰:工人为什么不能走向统一?工人,尤其是绝大多数惨遭剥削和压迫的工人为什么不去组织一个激进的政党?工人阶级团体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团体为什么不举行马克思主义革命?此类问题促使人们去寻找工人阶级的缺点。结果,人们对欧美工人力量分裂的原因予以特别关注,许多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男人和女人、老人和青年、北欧和南欧、美国的黑人和白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矛盾,使得工人们无法表现出阶级觉悟和对党的忠诚,或是在需要他们采取革命行动时置之不理。^①

这种分析导致人们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现代工人阶级。但是,这种阶级分裂是否只起负面作用,只是实现无产阶级“真正”使命的障碍呢?²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工人的分裂能为具有政治影响的工人阶级行动提供基础——不只是在支持这个或那个政党,而是在是否支持新成立的政权。社会的不同部分,甚至一个阶级内部的不同部分,可以构成与政府官员的不同联系——可以改变各自命运的联系。这并不是说,各种社会集团总是各行其道,对立的方面在这种扰人心绪的关系中总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是期望的结果。然而,我们的分析可以从头开始——严肃面对各分裂阶层的政治潜力,提供一种探索政府—社会互动模式的具体方法。

中国工人——与其欧美兄弟难分伯仲——也是四分五裂。然而,分裂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无论他们当中存在着如何重要的地缘、祖籍、性

^① 特别参见 Richard Jules Ostreicher, *Solidarity and Fragmentation* (Chicago, 1986); Charles F. Sabel, *Work and Politics: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Industry* (New York, 1982); David M. Gordon, Richard Edwards, and Michael Reich,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Cambridge, Mass., 1982); Ira Katznelson, *City Trenches: Urban Politics and the Patterning of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81); Suzanne Berger and Michael J. Piore, *Dualism and Discontinu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Mass., 1980); and Stanley Aronowitz, *False Promises: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Working-Class Consciousness* (New York, 1973).

别和技术熟练程度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差异),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完全有能力采取有影响的政治行动。

中国工人的政治影响

在 20 世纪中国的政治变革中,工人运动起了重要作用。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带来新政治文化的五四运动、国民政府的兴衰、共产党的胜利,甚至 1949 年以后政治形势的发展,无不深受中国工人运动的影响。^① 在一个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国度里,尽管工人人数相对较少,但中国工人往往以出其不意的或是自相矛盾的方式对现代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影响,在所有中国城市中,以作为产业中心的上海最为显著。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上海工人与学生的联合推动下,预示全国政治形势变化的工人运动呈周期性高涨。^② 这些事件后面都有一个有规则的模式,即每隔 20 年就要发生一次大事件。也许,正如托马

① 关于辛亥革命的背景,特别参见 Mary C.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1968); and 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Calif., 1976)。关于五四运动,参见 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60); and 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Calif., 1986)。关于国民政府,参见 Hung Mao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G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Calif., 1972); 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1974); and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ic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5* (Stanford, Calif., 1984)。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参见 Lucian Bianco, *Origins of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Calif., 1967); and Ch'en Yung-fa,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Berkeley, Calif., 1986)。关于 1949 年以后的中国政治制度,参见 A. Doak Barnett,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 (New York, 1967); and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Calif., 1970)。这些重要的著作都没有对工人加以特别描绘。

② Jeffrey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 Calif., 1970)。该书对 1919—1949 年间上海学生的作用进行了生动而深入的研究。

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描述美国那样,每一代新人都发现有必要采取自己的革命行动。

上海最著名的运动是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标志着一轮又一轮运动的开端,其后,即1926—1927年,紧接着就爆发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在五卅运动中,由于激进派学生的刺激,工人们愤怒抗议日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要求结束军阀统治。1927年3月,蒋介石北伐军占领上海,无疑受到了工人的大力支持,但是,这位总司令很快就发觉,受共产党人影响的工人对其新政权而言是个威胁。1927年4月,蒋介石及其帮会盟友开始镇压工人,正在形成的国民政府身上不可避免地涂上了一层“白色恐怖”的色彩。^①

20年后,即1946—1948年的内战时期,上海广大工人和学生充塞于街道,抗议国民党统治。通货膨胀、贪污腐败与(一定程度上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导致他们采取反抗国民党、准备迎接共产党势力的行动。^②

无论是在19世纪20年代、40年代、60年代,还是80年代,上海的抗议都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党派、政权和个人命运的兴衰都与这个城市的集体行动有关。然而,这并不是说,工人(或者他们的学生盟友)总能主导潮流。由政治化工人阶级的幽灵所造成的恐惧常常导致政府——无论是冠以共和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名号——采取与许多上海工人愿望相违背的政策。故关键之点不在于现代中国政治直接反映了工人的要求,而在于中国工人在现代中国政府的定义和发展中一直是一支特别重要的力量。

20世纪的中国政治领袖在描绘新社会蓝图时均予以工人阶级一种特别的地位。现代化几乎就是产业化的同义语,工人则被视为发展的代

^① 对这些事件的详细描述,可参见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 - 1927* (Stanford, Calif., 1970)。

^② 参见 Suzanne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 - 1949* (Berkeley, Calif., 1978)。